

脱弃机械的一片真诚

罗志田

人不是物,必须避免机械性的物化,所以人贵有自觉,即人人先能调理自己,然后再说改变环境。人不能“只在本能支配下过生活,只在习惯里面来动弹”,只有“开发我们的清明”,才能“让我们正源的力量培养出来”,达到孔子所说“从心所欲不逾矩”的境界。

世纪文景于今年5月重版了梁漱溟先生的《朝话》，这是积德的善事。梁先生是提倡“再创宋明人讲学之风”的人，北伐后他在山东邹平办乡村建设研究院，天天黎明起来领着他共学的年轻人作朝会，书中辑存的就是那时的谈话。这些谈话都是他对文化和人生的体悟，充满真知灼见，却又是娓娓道来；有些话看似浅出，其实相当深入。窃以为适应任何年龄段的读者。

梁先生出生于1893年，十多岁时科举制就被废除了，再两三年朝廷正式立宪，然而帝制旋被推翻，随后白话又取代了文言。在不过十多年里，就目睹了好几项以“千年”计量的根本性巨变，还不包括其他非建制性的长程巨变，最能体现那真是一个天崩地裂的时代。身临这样一个颠覆频繁而至的多事之秋，其感触非比寻常，对人生、人与人和人与自然的关系，认识可能很不一样，思虑也当更高远。读了《朝话》你就知道，这的确是当得起大时代的大认识。

书中的谈话发生在1932—1936年间，梁先生不过四十初度，却已身历两次改变政权的武装革命——前一次革命终结了几千年的帝制，后一次革命开启了新政。尤其辛亥革命、五四新文化运动和北伐等事件，在我们教科书中都被列为时代界标。一位传承了“澄清天下”责任感的读书人，从青少年起就频繁经历“时代”的转换，能不生无所措手足的彷徨和苦闷？

对梁先生而言，北伐前后又是他自己的反省期。一般情况下，梁漱溟常给人一种能坚持也愿意坚持的印象。实则他有些像他少年时仰慕的梁启超先生，一生多变，只是他号称自己的主张永远跟随着心中的问题，故比很多同时代人显得洒脱一些，既可以像梁启超那样“与昨日之我战”，还可以不像梁启超那样承认是在与自我作战，因为是心中的问题转换了，而不是他自己变了。

梁漱溟在五四后以揭出东西文化问题而迅速确立了在全国舞



《朝话》中的谈话发生在1932—1936年间，梁漱溟先生不过四十初度。

台发声的地位，但《东西文化及其哲学》一书刚出版，他心中的问题就开始波动，随后就有好几年的反省，思想观念有了不小的转变。其中一个主要的变化，就是他对中西文化的“不同”有了新的认识。此前他以为，只要经过一个世界化的阶段，“不同”的中西文化是可以趋同的——即中国可以西化，西方也可以中国化。北伐后他有了新的看法，主张中西文化的“不同”是根本的，无法趋同，亦即中国不可能西化。

《朝话》中的很多看法，就反映出梁先生思想的调整。作为一个天下士，中西既是他的关注所在，也是他表述的象征。其后的大关怀，是人类当时面临的问题和今后的发展。那些谈话中的一个重要面相，就是梁先生对今天我们所说的现代性，有很深刻的反思。他的一个核心看法是，人不是物，必须避免机械性的物化，所以人贵有自觉，即人人先能调理自己，然后再说改变环境。在梁先生看来，人类之所以超过其他生物，因人类有一种优越力量，能变化外界，创造东西。要有此变化外界的能力，必须本身不是机械的。如果我们本身是机械的，我们即无改变环境之力。

简言之，“人类优长之处，即在其生命比其他物类少机械性”。而“人类第一也是唯一的长处”，就是人能自觉，

“能调理自己”。

一个人缺乏了自觉，“便只像一件东西而不像人，或说只像一个动物而不像人”。因为“人类生命是沿着动物的生命下来的；沿着动物的生命而来，则很近于一个动的机器，不用人摇而能自动的一个机器。机器是很可悲悯的，他完全不由自主”。但人类不一样，“他是能超过于此一步的‘机械性’；因人有自觉，有反省，能了解自己”，这是其他生物所不能的。

像机器一样不由自主，常表现在不能管住自己。例如“好生气，管住不生气好难！在男女的关系上，见面不动心好难！他不知怎的念头就起了。更如好名、出风头等，有时自己也知道，好歹都明白，可是他管不了自己”。要改变这种“不停止的不自主的”机械性转动，就需要“了解自己，使生命成为智慧的”；减少“自己生命中之机械性”，而“培养自己内里常常清明自觉的力量”。

人不能“只在本能支配下过生活，只在习惯里面来动弹”，只有“开发我们的清明”，才能“让我们正源的力量培养出来”，达到孔子所说“从心所欲不逾矩”的境界。

中国人所说的“学养”，就是让人人能够自觉。所谓机械，大体即平常所说的“血气”。血气有盛衰，所以不可

靠。要使“人的神明意志不随血气之衰而衰”，就需要“增进自觉，增进对自己的了解”。孟子说的善养浩然之气，庶几近之。中国古人所探寻的，就是“能了解自己且对自己有办法的学问”。只要一生坚持求学，就能“让人生命力高强活泼”，不至于越老越衰，最终实现“一个自由的活泼泼的有大力量的生命”。

梁漱溟承认，他自己的“短处”，也在于“自己不会调理自己，运用自己”。而他治此病的方法，“就是‘诚’”。尽管还没做得彻底，“在某一些地方上的念头不单纯”，还有“自己在勉强自己”的外在努力，没能达到“整个生命力的伟大活泼”。但大家也都看出了他的“一片真诚”。

这的确是实话实说。在20世纪的人物中，梁漱溟是很特别的。总有一些人受他感动，终身追随左右。在社会资源日益被国家(state)控制的年代，这是很多“大儒”都没做到的。但梁先生做到了，因为他的“一片真诚”能够感人。

梁先生说过，他要复兴古人讲学之风，意在“使讲学与社会运动打成一片”。因为那时的中国社会，“无论在思想上、在事实上，都正是彷徨无主时候”。据他的观察，彼时最缺乏的，就是“社会的信任”。因此，现在的中国，必

须有人一面在言论上为大家指出一个方向，更且在心地上、行为上大家都有所信赖于他。然后散漫纷乱的社会才仿佛有所依归，有所宗信。一个复兴民族的力量，要在这个条件下才能形成。

而梁先生的志愿，就是“使自己成为社会所永久信赖的一个人”，能够“终身为民族社会尽力”。

他做到了。从他整个的生命历程，从《朝话》中的点点滴滴，我们处处可见那脱弃机械的一片真诚。更因他的一片真诚是透明的，所以特别有感召力。

在梁先生眼里，要让人信任，透明最重要。要“如何才能使社会信得及”呢？“只有彻底的开诚布公”，根本铲除一切“遮遮掩掩的行为”。这是通行的道理，“无论在家庭之间、政府与人民之间、一切人与人之间，皆是如此”。毕竟“人心都是要求光明磊落的”，只有“自身先不使人怀疑，人家才肯相信；人家相信得及，才肯舍死相助，终至万众一心”。

他是不是说出了你心中想说的话，看看《朝话》就知道了。
(作者为四川大学历史学教授)

策划：

文汇报理评部

执行编辑：

任思蕴 rsy@whb.cn

封面编辑：

陈韶旭 csx@whb.cn

封面图片：

日本绘《清国上海全图》

扫一扫微信公众号二维码，
关注文汇报

